

梁思成与联合国大厦设计

LIANG Ssu-ch'eng and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Design

曾忠忠 | ZENG Zhongzhong 刘梦涵 | LIU Menghan

摘要: 1946年, 梁思成受当局委派赴美考察美国战后的建筑教育, 期间梁思成代表中国建筑师积极参与了诸多国际建筑事务, 是我国首位参与国际事务的现代建筑师。本文梳理梁思成第二次访问美国期间(1946.11—1947.7)所参与的国际事务, 着重讲述梁思成参与联合国大厦过程中所提出的方案和建议, 探究梁思成在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过程中映射出的现代主义思想, 以完善国内对梁学的研究史料。

关键词: 梁思成、二次访美、国际事务、联合国大厦设计

Abstract: In 1946, LIANG Ssu-ch'eng was appointed by the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American post-wa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LIANG Ssu-ch'eng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many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 behalf of Chinese architects, and was the first modern architect in my country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is article combs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at LIANG Ssu-ch'eng participated in during his second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1946.11—1947.7), focuses on the plans and suggestions made by LIANG Ssu-ch'eng during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and explores the modernist ideas reflected by LIANG Ssu-ch'eng participation in the design of the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To improve the historical data on the study of Liang in the country.

Keywords: LIANG Ssu-ch'eng, Second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design

一、引言

梁思成(1901—1972)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1], 他的学术思想始终与国际接轨, 国际视野的历练让其能力、格局和视野进一步拓宽, 无论是学术的感观, 亦或是教育层面的交流, 都与其思想提升有着莫大的关联, 也规约了他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学发展方向设想的路径, 尤其是对国际理念和制度的借鉴, 使得中国建筑学能立足于一个较高的起点, 并在数十年内获得了快速发展。

20世纪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战后百废待兴, 城市化浪潮逐渐兴起, 现代化思潮渐成主流, 工业制造水平大幅提高, 种种契机引发西方建筑界一系列革命性变化, 涌现出一批思维活跃、

理念新潮、视野宽阔的建筑师。他们吸收借鉴前人及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以来的设计思想和建筑实践, 对时下潮流有着敏锐的感知, 对建筑界和与之匹配的建筑学界革新不断提出系统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研讨^[2],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彼时建筑教育的变革。此时的中国, 尚在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刚刚停歇和接踵而来的内乱未平, 重构和新建远未进入大众视野, 学界无暇进行更大格局的深入思考和参照学习, 对大洋彼岸的新兴思潮灵敏度不够, 观念和实践各个方面都与世界主流脱节。几所设有建筑学专业的高校, 还沿用着古典的布扎体系。此时的梁思成等一众国内建筑学界的先驱, 对于这一过于注重派别形式、不近实际的教学模式已深怀隐忧, 一方面坚信中华大地新景即

作者:

曾忠忠, 博士,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系副主任、副教授, 本质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刘梦涵,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系硕士研究生。

中央高校基金重点项目(2021JBW B006)。

DOI: 10.12285/jzs.20211019005

将来临；另一方面思虑眼下建筑学界现状及储备的陈旧和贫瘠，难以培养出富有创造力的实用人才，对于不能适应此后中国的发展需要感到忧心^[3]。

1946年，教育部委派梁思成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教育”，但略微昂贵的考察经费让他左右为难。恰耶鲁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向梁思成发来邀请函。耶鲁大学邀请他担任1946—1947学年的客座教授，到康州纽黑文（New Haven）讲授中国建筑和艺术；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担任1947年4月举办的“远东与文化会议”国际研讨会主席。困难迎刃而解，经费不再成为其出国考察的绊脚石^[4]。

1946—1947年访美期间，梁思成参与了多项国际事务，如出席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会议”（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Bicentennial Conference on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梁思成在其中作了“唐宋雕塑”（Tang and Sung Sculptures）与“建筑发现”（Architectural Discoveries）两场学术演讲，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建筑与艺术^[5]；出席“人类体形环境规划会议”（Conference on Planning Man's Physical Environment），会议共涉及8个主题：设计的社会基础（The social basis of design）、限制与机遇（Limitations and possibilities）、形式（Form）、教育（Education）、规划（Planning）、空间使用（Space use）、启发与应用（Inspiration and pragmatism）、印象与结论（Impressions and conclusions），不同学科的融合交流为梁思成体形环境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持^[6]；与此同时，梁思成还担任了联合国总部（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的设计顾问。

访美闲暇之余梁思成实地考察了当时美国的重要工程项目。梁思成在好友斯坦因（Clarence Stein）的引荐下参观了雷朋（Radburn）新城、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水坝（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洛杉矶鲍德温山（Baldwin Hills）的住宅区、芝加哥住宅管理局（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等重要项目，观后其感触颇多，并表达了希望“中国拥有数百个TVA”的

期盼^[7]。

对于梁思成个人来说，多项国际事务的参与以及与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沙里宁（Eero Saarinen）、马修·诺维奇（Matthew Nowicki）等建筑大师的深度交流，促进了其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开拓了其对建筑学的定义，为其美国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对于民智初启的中国来说，西方的学术造诣、研究能力、思想方法、学科开拓建设等方面更加前沿与实用，容易被中国当时的教育界以及其他各界所接受学习，也为我国战后重建提出了可实现的设计方法及扎实的理论基础。

因此，二次访美的经历是研究梁思成学术思想变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随着学者们对史料的不挖掘，梁思成二次访美的经历逐渐清晰。有学者从建筑教育的角度出发，探讨梁思成“体形环境论”的起源、在教学上的应用及发展^{[8][9]}；有学者通过对比梳理国外学者的城市规划思想，或结合其归国后发表的文献，探讨梁思成城市规划思想的转变、发展。^{[10][11]}但是，有关梁思成在联合国大厦设计中的经历至今没有得到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其中较为具体的内容在清华大学纪念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上展出的一段音频资料中有所显示：

“我们应该把这栋大楼放在冬天能够获得最多阳光的方位上，让它较长的一边朝南。”^①

本文梳理梁思成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的详细经历，包括其提出的Scheme24、对其他方案、图书馆、大会厅、秘书处的建议，结合其归国后的多项改革、实践、理论，探讨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对梁思成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完善国内对梁学的研究史料。

二、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设计实践

1943年10月40日，苏、美、英、中四国代表在莫斯科会议上共同发表了《普遍安全宣言》，表达了建立一个战后

国际安全组织的主张^[12]。为系统地进行联合国大厦的设计，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Lie）决定设置一个国际设计委员会（The Board of Design Consultants），任命哈里森为规划主任和国际设计委员会主席。^②^[13]1946年，在耶鲁大学讲学的梁思成，受到国民政府的推荐与哈里森（Wallace Kirman Harrison）的邀请，担任设计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结合各国提名人选及哈里森的起草名单（图1），最终确定了委员会的10名成员：梁思成、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巴索夫（Nikolai D. Bassov）、霍华德·罗伯逊（Howard Robertson）、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斯文·马凯利乌斯（Sven Markelius）、恩尼斯特·考米尔（Ernest Cormier）、G.A. 苏里乌克斯（G. A. Soilleux）、盖斯顿·布鲁法特（Gaston Brunfaut）、Julio Vilamajo（图2~图4）。

从1947年2月17日第一次会议到1947年6月9日最后一次会议召开，为期93天共举行45次会议，形成了75个草案（图5）。围绕方案的会议讨论非常激烈，设计委员对联合国大厦设计观点各不相同，关注内容包括建筑与场地周边环境的关系、



图1：哈里森起草任命国际设计委员会主席成员的建筑师和国家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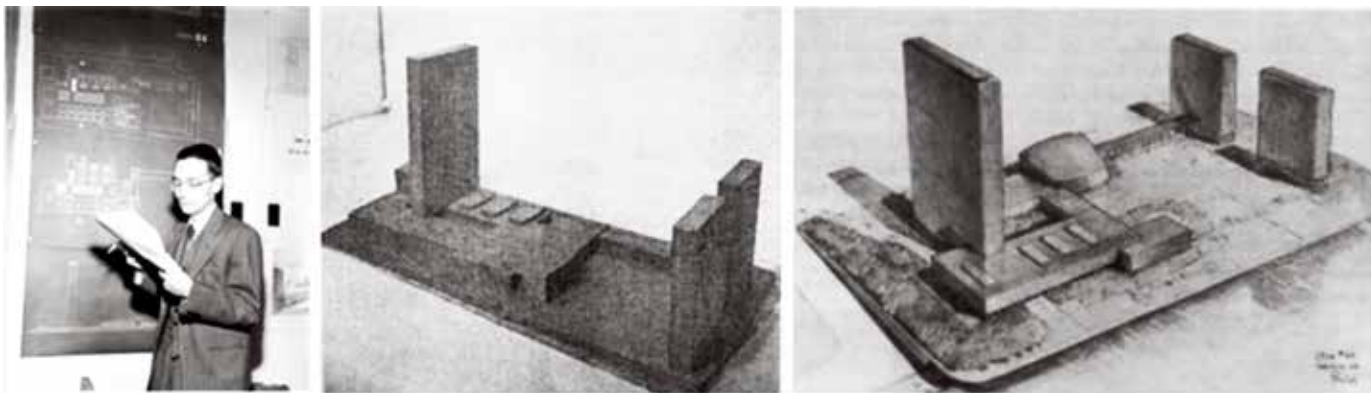


图7: 从左至右图片内容分别为: 梁思成演讲 Scheme 24; 东北方向鸟瞰图; 东南方向鸟瞰图

的朝向方位: 东河的景观面以及建筑的巨大阴影。据此, 巴索夫提出将东河的景观引入建筑中, 且最大限度避免建筑物处于阴影中。梁思成则从日照对使用者的影响上考虑布局。他认为在冬季, 应该最大限度地获取日照, 夏季则应有所区别, 需要重点考虑严重的西晒问题。因此, 布局上建筑向东西向延伸, 可最大限度地利用阳光。既可以营造舒适的室内环境, 还可提高工作效率, 更重要的是可节省安装空调等其他设备的费用, 节约建筑费用。^{⑤[13]}

第 14 次会议中, 委员们考虑到秘书处的周边环境、电梯摆放位置等因素, 对其位置进行了重新讨论。部分委员认为应该拆除基地旁边的住房管理大楼, 也有意见将住房管理大楼收购以扩大基地。梁思成从另一个角度出发, 提出应改变秘书处的位置, 向东南方向移动。^{⑥[13]}

随后的几次会议中梁思成与其他顾问对联合国大厦的前期规划和各项细节进行了深化。在第 26 次会议上, 梁思成提出了自己完整的方案——Scheme 24, 也被称为“the Two Court Scheme”(图 7): 方案整体布局采用中国经典的回廊式。他建议联合国秘书处大厦位于基地南端, 一如历代重要的中国建筑那样坐北朝向, 长长的前厅入口朝向温暖的南面, 与会议室形成 90° 夹角^[4]; 会议室沿场地的长边放置, 靠近东河一侧; 图书馆位于基地的东北角; 三栋建筑围合形成两个内向的庭院——中心庭院和休息广场。与此同时, 会议室和秘书处大楼围合形成中心庭院, 且高耸的秘书处大楼为中心庭院提供遮阳; 此外, 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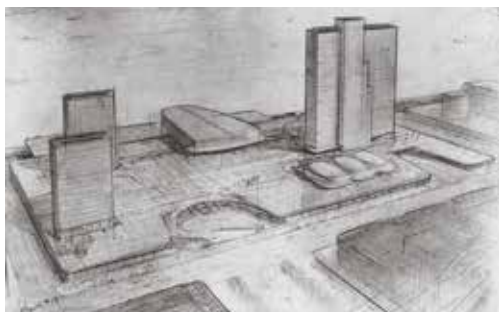


图8: Scheme 17 鸟瞰图手绘



图9: 梁思成研究 Scheme 17 场地模型, 他自己的方案张贴在身后的墙上; 左边是索伦森

思成利用大楼的垂直交通, 将会议室竖向划分。^{⑦[13]}可是他事先没有想到, 大厦选址在东河之滨, 那四十层大厦最好坐落在地基的四十二街那一头, 这样多数公务人员可以直接进来, 若按此设计, 就意味着北面整个地区都要长年笼罩在阴影之中。^[4]

对于梁思成的方案, 设计委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委员认为这与总部对所有人开放的概念背道而驰, 相比之下, Scheme 17 更加开放、简洁(虽然尼迈耶否认有此功劳, 但仍被归属为尼迈耶提出的方案)(图 8、图 9)^{⑧[13]}。并且南北向的秘书处会对周边建筑产生遮挡。巴索夫提出了四个建议: 长条形建筑应平行于基地长边放置, 避免将基地分割成两部分; 对于使用者来说, 河边的风景更具有观赏价值, 因此秘书处南北向放置更有利于使用者观赏风景; 秘书处南北向放置能够将游客的视线聚焦于联合国大厦上, 减少其他建筑物对游客的视线干扰; 相较于南侧, 办公人员更适合在秘书处的西侧办公。^{⑨[13]}

一些委员认为该方案是很有创意和可取的, 譬如沃克提到东河上的交通十分繁

忙, 东河下游的群众、游客来讲, 河上的风景也是很重要的。从任何角度看, 联合国都必须与它的背景有所区别。从北面看, 梁思成的方案确实隐藏了爱迪生联合公司和通风塔。^{⑩[13]}在与 Scheme 20 进行比较时, 沃克补充道梁思成将第 43 街作为西边重要的行人入口的做法有利于区分不同的人流。^{⑪[13]}

至此, 大部分委员同意秘书处沿南北向放置。在第 27 次、29 次、32 次会议上, 梁思成再次强调了秘书处的朝向, 他认为无论是从采光还是从热辐射的角度来说, 南北向的建筑不太有利, 以东西为轴线可以更好地看到曼哈顿和东河。^{⑫[13]}并且强调板式建筑有利于光线的射入和职员办公。第 34 次会议, 他看到西卡(Syska)的检测报告后, 发现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相差不多, 欣然同意了秘书处采用南北轴线。^{⑬[13]}

虽然梁思成的方案与所提出的建议在当时并未被整体采纳, 但对最终方案与后续方案的产生具有推动作用。首先梁思成的方案为 Scheme 19、Scheme 25 的生成提供了灵感; 其次, 梁思成在 43 街设置行

人入口的方式有所保留，即联合国工作人员可以从第43号街东侧进入秘书处，起到了人群分流的作用；最后设计人员在综合考虑了周边的交通系统后，把秘书处大厦的位置安排在基地的南端，但出于对建筑物的美观以及秘书处阴影投射面积的综合考量后，将秘书处设置为南北走向。

梁思成对于秘书处南北向的坚持源于其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人文主义精神，其为整个设计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方案或几条建议，还包含了对建筑本身历史性、经济性、人文性的考量。

四、有机性——梁思成对图书馆的规划

对于图书馆的设计，委员们的关注点在是其否成为独立建筑物。第1次会议上，巴索夫认为图书馆应建设成为综合体，哈里森认为图书馆应与秘书处结合，柯布则认为图书馆在整组建筑中的重要性不亚于秘书处，且在未来还可能在其中举行研讨活动。梁思成提出图书馆的藏书量会不断增多，其增长速度大约为每年3.5万本。因此为适应其可生长性，应将图书馆单独建造。在第34次会议上他又重申了这一主张。梁思成将图书馆比作一个可持续生长的有机生命体，对未来发展进行规划的方法，与沙里宁有机疏散论中将城市与生物体类比的作法有异曲同工之处。正如梁思成在阅读《城市：其生长、衰败及未来》一书时写道：“建筑必须表现时代的需要，必须与环境联系。”（图10）

根据数据显示，建设完成后的联合国图书馆每年通过购买和赠送大约可收集到图书1.3万册、报刊11万份、政府出版物11万件、联合国出版物13万件、地图1300件，共3.63万本藏书。^①藏书的增长

长幅度与梁思成最初预估的每年3.5万本基本相符。梁思成对于图书馆的建议初步体现了其有机生长的思想。

五、功能性与象征性——梁思成对会议大楼的思考

会议厅大楼作为联合国大厦的标志性建筑物，委员们对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内容涉及周边场地和建筑的联系，会议厅的形式、内部布局、桌椅尺寸等。由于对会议厅的讨论较多，且较为分散，穿插于不同的会议之中，因此本文仅研究梁思成所提出的建议。

会议厅模块尺寸：第7次会议讨论场地整体规划之后，委员们对会议室模块的尺寸进行了讨论。阿布拉莫维茨认为每人3英尺的办公空间足够了，且办公桌的尺寸最好为100英尺×70英尺的椭圆形，这可以最大限度节省会议室的空间。柯布则坚持采用1.5米作为基本单元，他认为每个单元都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体块，有其自己的生物特性。并且每个单元内都有新闻、广播、公众、秘书、代表、顾问、服务人员等。梁思成从经济实用的角度出发，提出圆形的桌子并不经济，并且还应考虑同声翻译的空间。经过多次讨论，本次会议最终的讨论结果为采用100英尺×70英尺的模块，每个模块包括大小为10平方英尺，用于同声翻译、媒体等其他功能的空间。

会议厅布局：设计委员对于会议厅布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公众、代表、媒体三者之间的分布关系上：三者是否处于同一空间？若处于同一个空间是将三者竖向布置，或水平布置？若竖向布置，三者的座位又将如何安排？

第9次会议上，阿布拉莫维茨首先总结了目前已有的三种竖向分布方式（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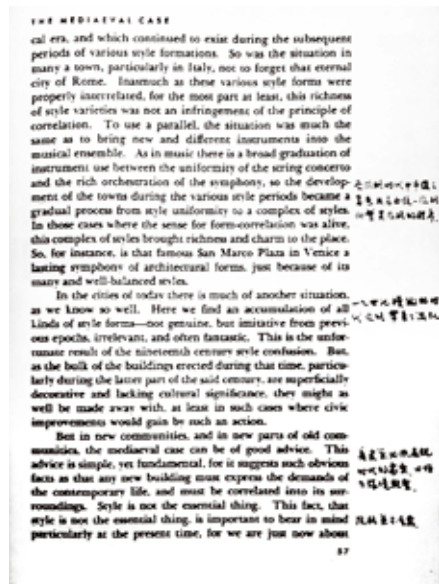


图10：梁思成批注的埃利尔·沙里宁著《城市》（The City）

图11）：公众座位在媒体座位上方，媒体座位在代表席上方；媒体的座位在代表席上方，代表座位在公众座位上方；公众座位在代表座位上方，代表席位在媒体座位上方。^{②[13]}随后哈里森提出了三个问题：公众座位是否应该和代表席位设置同一房间？若设置在同一房间，公众席位是设置在会议桌旁边，还是在公众与代表之间加设玻璃，将二者的座位分开？除此外，哈里森还提出在会议室中，公众的座位可以设置在会议室内任何地方，但不应该围绕代表席设置，这种做法会让代表感觉自己身处剧院中，不够庄重。^{③[13]}梁思成则从公众和代表相对关系提出思考问题：是将公众席置于代表席后方，让公众单方面看到代表好；或者让代表席与公众席对立设置，让联合国代表面向公众更好。^{④[13]}巴索夫认为可以采用圆桌会议的原则，公众围绕着代表落座，这样代表就可以看到大多数公众的面孔。^{⑤[13]}柯布同意巴索夫的观点。^{⑥[13]}大会堂最后采用了圆桌会议的形式，且每个单元都配备了同声译的功能。



图11：阿布拉莫维茨总结的目前已有的公众、代表、媒体三者三种竖向分布方式



图 12：马凯利乌斯的 Scheme 29 从东北方向看：大会厅采用圆顶；秘书处面向东西；南面为代表大楼

会议室等房间平面布局：第 18 次会议，梁思成建议将会议室、委员室的房间放置在东河一侧，他认为窗户到走廊的距离过深不利于房间的采光。^{④[13]} 第 23 次会议上，他提出利用第一大道的自然光线进行会议室的采光照明更为有利。^{⑤[13]} 第 30 次会议上提出将会议室、委员会、理事会放置在不同楼层上可以获得更加开敞的空间。^{⑥[13]}

总体来看，无论是从采光，还是从空间、结构的角，梁思成更倾向于建筑竖向发展。

会议厅大楼的建筑形式：会议厅大楼作为整个建筑群重要的单体建筑，既要体现政府的形象，又要融于基地，因此合适的建筑形式尤为关键。部分人赞同采用圆顶的形式以象征联合国大厦作为政府中心的地位，这种做法既符合当地政府的认知，也便于获得国会的资金支持；部分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好的建筑本身就是不朽的，自身就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与此同时，良好的功能布置还能给使用者带来美感，形式、功能、美观三者和谐统一。第 30 次会议，与会代表结合马凯利乌斯的 Scheme 29（图 12），对会议大厅采用何种形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 Scheme 29 中，马凯利乌斯采用了政府为象征权威常用的圆形，他认为联合国大厦作为整个地区，甚至纽约地区重要的中心地标，应有别于其他商业建筑，突现其本身的权威性。巴索夫认为虽然很多项目的大会厅都会独立设置，并且采用圆顶的形状，这种方式有一个优势，即会议厅的上层不设置餐厅。此外，巴索夫认为

圆顶仅仅是一种设计手法，我们应减少这种突现政府地位的设计手法的使用。^{⑦[13]} 阿布拉莫维茨认为大会厅与秘书处有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作为一个单独的体量和秘书处分开设置；部分体量穿插在秘书处内；全部包含在秘书处内。因此，选择哪种处理方式是会议厅最终表达形式的关键。^{⑧[13]} 魏斯曼（Ernest Weissmann）提出将座位集中在会议厅穹顶下正中心给使用者体验感觉不好。^{⑨[13]} 梁思成从会议厅的国际性和不朽性角度出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建筑本身是否应该具有不朽性。^{⑩[13]} 柯布认为好的建筑本身是不朽的。会议厅的设计必须尊重会议使用者，询问他们的意见，不朽性并非一个建筑层面的问题。^{⑪[13]} 尼迈耶认为圆顶的形式并不重要，但合适的空间将会给人美的感受。第 31 次会议开始时，对于会议厅形式的问题，众人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巴索夫认为时代会变，当下的象征符号并不一定适用于明天，因此建筑上的象征主义并不必要。尼迈耶提出联合国是需要给予世界安全感的有机体。他认为这是建筑精神，很难将其转化为钢铁、石头等材料。但是，如果我们设计出联合国大厦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那么设计本身的力量将使它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梁思成再次强调，简洁是一种美德，联合国大厦是代表世界的并非某一个国家的，理应具有国际性。^{⑫[13]}

大会堂最后依然采用了圆屋顶，同时在大会堂的南端设计了一扇巨大的玻璃窗，与会人员可以透过玻璃窗俯瞰秘书处大厦广场，整个设计既有不朽性又兼具艺术性^⑬，与梁思成所倡导的现代性、人文性相符。

六、梁思成对其他方案的建议

经过多次探讨，在第 31 次会议上，委员会对已提出的完整的 20 个方案进行初步筛选，综合与会人员意见，保留 Scheme 9、Scheme 17、Scheme 23、Scheme 25、Scheme 27A、Scheme 28、Scheme 29、Scheme 30 共 8 个方案进行下一步的深化。第 32 次会议上，尼迈耶又提出了新的方

案——Scheme 32（图 13）：该方案将秘书处与会议厅分开，通过坡道、走廊等交通空间将二者连接。会议厅延伸到河边，加强了与群众之间的联系，节约了内部场地空间。同时低矮的会议厅与秘书处形成鲜明的对比，将秘书处凸显出来，游客、群众可以将视线聚焦于此，办公人员可以与获得良好的景观。此次会议中，梁思成对尼迈耶从北到南高层平板的建筑方案表现出了极大认同和大力支持。从与会人员的反应来看，尼迈耶的方案获得了大多数设计人员的支持。^{⑭[13]}

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中，众人对已保留的 Scheme 8 及尼迈耶新提出 Scheme 32 进行进一步深化。

第 36 次会议，形成了两个关键深化方案：以柯布、尼迈耶、博迪安斯基、魏斯曼为中心的：Scheme 23/32（Scheme 23、Scheme 32 的融合）（图 14），以安东尼德斯（John Antoniadis）、苏里乌克斯、哈夫利切克（Havlicek）为中心的 Scheme 43（Scheme 41、Scheme 42 的融合）（图 15）。后续会议围绕两个方案进行讨论。

第 37 次会议中，博迪安斯基以 Scheme 23/32 为基础，综合设计人员提出的意见进行深化，形成 Scheme 42 系列。后续会议中，众人对 Scheme 42 系列进行了讨论和发展，衍生出 Scheme 42A、Scheme 42B、Scheme 42C、Scheme 42E、Scheme 42F、Scheme 42G 六个方案。本文对梁思成针对几个方案提出的建议进行总结：

Scheme 42A：梁思成认为其忽略了北半部场地的使用，建议将平面修改成十字形，以降低建筑物的高度和宽度，获得更好的水平和竖向交通，并且有利于提供风力支撑。^{⑮[13]}

Scheme 42B：外部的整体性被打断，会产生歪斜和一些不利的夹角。

Scheme 42C（图 16）：该方案增加了第五会议室、影院和额外的大型会议室。

梁思成认为 Scheme 42B 与 Scheme 42C 并非同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二者选择有一个是较为正确的。梁思成本人更注重建筑的艺术性，因此他认为 Scheme 42C 比 Scheme 42B 更为美观。^{⑯[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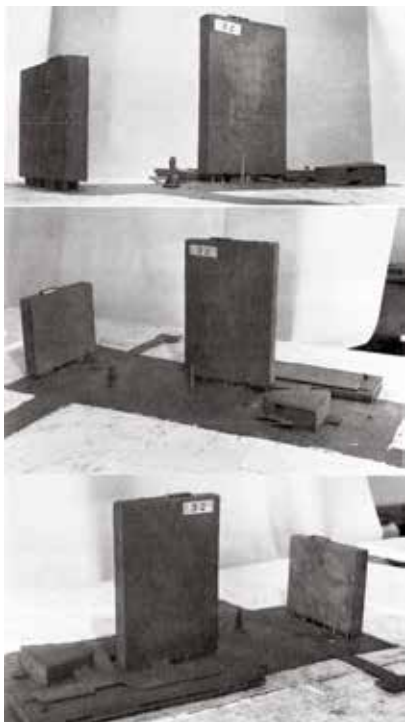


图13: 尼迈耶Scheme 32的模型, 从上至下依次为: 从场地西北角向东看; 从西边看鸟瞰图; 从东南方向看鸟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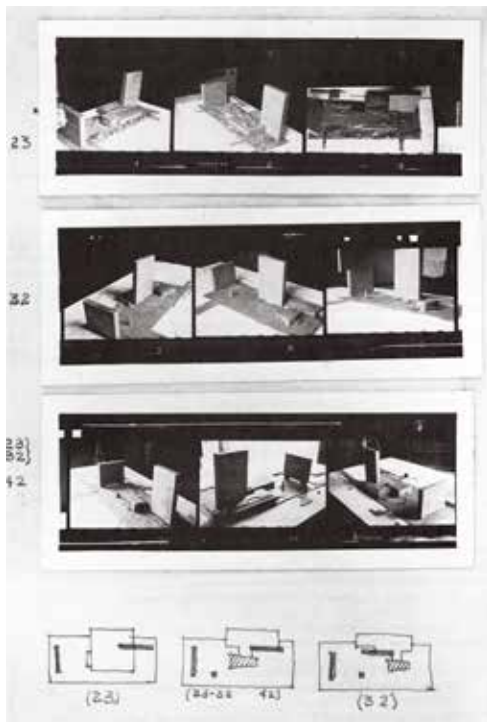


图14: Scheme 23, Scheme 32, Scheme 23/32

定程度上展现了其能在建筑学界领跑文明发展的底蕴和功力。

在具体的方案探讨中, 深具西方建筑学素养的梁思成与西方建筑师在以人为本主义层面有所共识, 设计中注重人的日常使用需求, 但与西方建筑师过于侧重建筑物的功能与形式不同, 梁思成坚持将传统的庭院融入设计要素中, 为整个场地带来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深重的历史感。正如他自己所说, 相较于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设计师, 自己更像一个史学家。^{②[13]}

在设计主张中, 梁思成增加了对历史文化等精神层面的考量, 将建筑物视为承载文化内核和精神内涵的艺术品, 融入其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思考和精进, 在设计实践中, 将中国元素融于规划之中, 并追求建筑物结构技术的合理性, 达到技术和艺术结合、理性与感性交融, 在穿越历史中彰显永恒。

1947年6月9日, 联合国设计顾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召开, 梁思成在联合国设计委员会担任顾问的任务也就此结束。^[13]

彼时, 对于与会的设计人员来讲, 梁思成并没有柯布、尼迈耶等著名建筑师为世人所熟知, 对于这一来自有着悠远历史东方国度的建筑家, 大家在此前听闻更多的是其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学术成就。

乔治·杜德利在对梁思成先生的回忆中写道: “他的加入对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是一件大好事, 尽管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他或他的成就。他给我们的会议带来的比任何人更多的历史感, 远超勒·柯布西

耶的直接历史感——他坚持远离布扎艺术风格, 对文化变迁倒没什么反应。”^[14]

给这些外国建筑家留下深刻印象, 属于梁思成标签的“历史感”, 在方案设计与研究讨论, 及至最终的方案成形中, 都呈现出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广袤无垠的中华大地、深远厚重的中国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和梁思成本人孜孜数十年对中国传统建筑理念的理解与重构,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博大深邃“历史感”的有力支撑, 并且随着时势变化、格局扩大、认识提升, 其内涵也在不断更新、丰富和完善, 在中西方的高层次专业交流中实现了跨国别的认同, 在一

七、结语

第二次赴美考察经历为梁思成提供了新鲜的血液和养分, 实现了自己学术思想的再次突破, 为国内带来了新的现代主义建筑理念、教学素材,^[15] 其中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的有四点:

1. “纵有千古”的历史逻辑, 作为首位参与国际事务的现代中国建筑师, 既有对中国建筑史继往开来的开拓, 也有对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中兼收并蓄的创新, 更有将中国建筑独特的艺术性和人文性积极融入世界潮流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2. 以“横有八荒”的时空逻辑, 对清



图15: Scheme 41, Scheme 42, Scheme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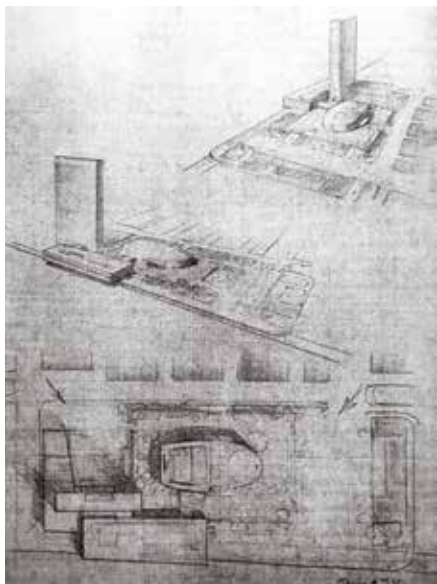


图 16. 从三个视角看 Scheme 42C

华大学营建学系的改革，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城市规划专业雏形^[9]，也为我国建筑学教育提供了范式。

3. 以“融汇东西”的理论逻辑，提出分区、邻里单位、环形辐射道路网、人口面积有限度的自给自足市区 4 种体形基础去实现 15 个目标，为我国新中国城乡大规模重建提出了可实现的规划方法及扎实的理论基础。^[12]

4. 以“兼济苍生”的价值逻辑，提出体形环境论的，拓展了建筑学的范围，促进了人居环境等学科、理论的研究。

对于世界来说，梁思成亦是第一位将自己民族的优秀建筑文化系统地展示于世界学术界的中国建筑人，改变了当时西方一味贬斥中国建筑文化的态度^[15]。尤其是在联合国大厦的设计中，梁思成所表现出来的谦逊的态度和丰富的文化底蕴，让设计委员们深为折服。

20 世纪初，现代主义设计源起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综合国力强盛，现代设计中心转移至美国影响全世界。而现代设计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依托于稳定的社会环境、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备的教育体系和长期的学术积累，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当时的中国，国力衰微、民生凋敝，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建筑的前驱，以强烈的爱国心、坚定的报国志和理想大于天的职业使命，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不

断浇灌中国现代设计这棵大树，新芽岁岁破枝、枝干年年伸展。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需要深刻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大变局之中，既有困局之难，也有破局之机，如何对待历史机遇和风险挑战，如何正确处理中与西、新与旧的关系，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增强持久力，如何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开拓性、创造性地做好建筑教育和建筑实践，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纵观梁思成一生，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无论是最初从美国留学归来引进的布扎教育体系，还是赴美考察归国后提出的体形环境论，梁思成并非一味地“拿来主义”，而是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入西方先进的理念之中，创建属于自己民族的范式。现今，梁思成的学术思想依然具有时代意义，其中的内涵值得我们反复挖掘。

[本文在定稿过程中，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丁力扬、东亚语言与文化系 Nancy S. Steinhardt，以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亦师提供了多种帮助，特此鸣谢！]

注释

① 梁思成在联合国大厦会议中的发言，来源于作者参观纪念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展时对视频的录音。

② George A. Dudley, A Workshop for Peace Designing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M]. New York: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Foundation an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4. xi.

③ 同② p311。

④ 摘自梁思成对自己方案的阐述，详见关于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的纪录片：Peter Rosen, A Workshop for Peace[EB/OL].[2021-08-20].<https://www.unmultimedia.org/avlibrary/asset/2618/2618423/>.

⑤ 同② p203。

⑥ 同② p171。

⑦ Headquarters[M]. New York: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Foundation an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4. 172.

⑧ 同② p175。

⑨ 同② p187。

⑩ 同② p256。

⑪ 摘自联合国对图书馆的介绍，参见：<https://www.un.org/zh/aboutun/history/hq8.shtml>

⑫ 同② p93。

⑬ 同② p94。

⑭ 同② p133。

⑮ 同② p155。

⑯ 同② p220。

⑰ 同② p222。

⑱ 同② p224。

⑲ 摘自联合国对大会堂的介绍，参见：<https://www.un.org/zh/aboutun/history/hq6.shtml>

⑳ 同② p252。

㉑ 同② p285。

㉒ 同② p294。

㉓ 同② p224。

参考文献

[1] 赵英，杨豪中，朱少华. 浅析梁思成早期建筑思想[C]. 工业建筑, 2017 (增刊II): 25-27+35.

[2] 姚志奇. 建筑设计教育体系溯源[J].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1, 37 (02): 69-73.

[3] 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 第五卷[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4] (美) 费慰梅著; 成寒译. 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5] Princeton University, 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Conference report][R]. Princeton University, New Jersey, 1946.

[6] 魏瑞瑞(Ngai Rui Rui). 清华建筑学院收藏家具与梁思成体形环境论之对照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5.

[7] 朱涛. 阅读梁思成之七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综述: 1930—1949[J]. 时代建筑, 2013 (04): 148-155.

[8] 崔婉怡, 许懋彦. 梁思成以“体形环境”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建筑教育思想形成与实践探析[J]. 建筑师, 2021 (05): 39-52.

[9] 庄惟敏. 中国语境下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国际范式——“体形环境”建筑思想与清华建筑学院的发展[J]. 建筑学报, 2021 (09): 9-15.

[10] 赖德霖. 《市镇的体系秩序》与 1940 年代中期梁思成学术思想的发展及社会理想[J]. 建筑学报, 2021 (09): 19-25.

[11] 姚颖. 梁思成佚文《建筑市镇设计的新观点》介绍[J]. 建筑师, 2021 (05): 53-57.

[12] 胡志刚. 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1928—1955)[D]. 天津: 南开大学, 2014.

[13] George A. Dudley, A Workshop for Peace Designing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M]. New York: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Foundation an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4.

[14] 李喜所, 胡志刚编著. 梁思成的前世今生 最后的贵族[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0: 258.

[15] 梁思成著. 梁思成全集第 9 卷[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200.

图片来源

图 1: 参考文献[13], 作者改绘

图 2~图 4: 参考文献[13]

图 5: 参考文献[13], 作者重新绘制

图 6~图 9: 参考文献[13]

图 10: 作者自摄

图 11~图 16: 参考文献[13]